

俞樾的经学思想与

罗雄飞◎著

当代学者人文论丛

YU YUE DE JING XUE SI XIANG YU JING XUE YAN JIU FENG GE

经学研究风格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俞樾的经学思想与经学研究风格

罗雄飞 著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俞樾的经学思想与经学研究风格 / 罗雄飞著. — 成都: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4.3
ISBN 978-7-5647-1931-9

I. ①俞… II. ①罗… III. ①俞樾 (1821~1907) — 经学—思想评论 IV. ①B259.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26069 号



俞樾的经学思想与经学研究风格

罗雄飞 著

出版: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成都市一环路东一段 159 号电子信息产业大厦)
邮编: 610051

策划编辑: 陈松明

责任编辑: 张 鹏

主 页: www.uestcp.com.cn

电子邮箱: uestcp@uestcp.com.cn

发 行: 新华书店经销

印 刷: 三河市天润建兴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70mm×240mm 印张 15.75 字数 246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3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4 年 3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47-1931-9

定 价: 48.00 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 本社发行部电话: 028-83202463; 本社邮购电话: 028-83201495。

◆ 本书如有缺页、破损、装订错误, 请寄回印刷厂调换。



1907年2月5日经学大师俞樾逝世

简介：

1907年2月5日，章太炎的老师，主持诂经精舍31年之久的俞樾去世。

俞樾，1821年生，浙江德清人，道光进士。以“花落春仍在，天时尚艳阳”一诗博得阅卷官曾国藩的击节赞赏。其后，他便以“春在堂”为其诗文集总名。俞樾曾任翰林院编修，河南学政等职。他学识渊博，撰述众多，其中《群经平议》、《诸子平议》、《古书疑义举例》等，成为乾嘉学派后期的代表著作。

俞樾还非常重视小说、戏曲对教化的作用，曾将石玉昆的《三侠五义》改编为《七侠五义》，颇受世人欢迎，得与原书并行。章太炎在学术思想上深受俞樾的影响。



序 一

俞樾（1821—1907），字荫圃，号曲园，是我国晚清时期著名的经学家和教育家。他是在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清政府重建文化秩序这一时代背景下出现的一位通儒，也是曾国藩、李鸿章等人着力揄扬的一个学术典型人物，颇受礼遇。曾国藩曾将他与李鸿章相提并论，时人以“山中宰相”视之。他主持杭州诂经精舍等书院长达30多年，培养了大批学术人才，章太炎、崔适、朱一新、戴望等皆出其门下，故有“门秀三千”的美誉。他在日、韩等国亦颇有声誉。

俞樾的学术成就主要在校勘、训诂群经及诸子研究方面。此外，在通俗文学、书法以及中医文研究方面也有相当成就。《春在堂全书》是他的学术著作总集，而以《群经平议》、《诸子平议》、《茶香室经说》和《古书疑义举例》等书为代表作。《群经平议》诸书对“十三经”进行全面校勘整理；《诸子平议》等则遍注子书40余种；《古书疑义举例》归纳出古文“文例”88则，为我国古汉语语法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章太炎、梁启超、刘师培、马叙伦、杨树达等先生都有高度评价。顾颉刚先生誉之为晚清最有声望的经学家，陈寅恪先生誉之为“一代儒林宗硕，湛思而通识之人”（见《俞曲园先生病中吃语跋》，载《寒柳堂集》）。

《俞樾的经学研究及其思想》一书，是罗雄飞同志的博士学位论文。2002年12月12日，我参加了他的论文答辩会。此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在此之前，就我所知，研究俞曲园先生生平事迹的文章不多，专门研究他的学术思想的就更少——不过三数篇。近年来对他的研究虽有所升温，但

多数是文学、考据学和中医文献学研究方面的论文，系统研究他的学术思想的成果几乎没有。这种现象与俞曲园的学术地位是极不相称的。罗雄飞同志的这部全面研究俞曲园学术思想的论著，不能不视为“毕露蓝菱”之力作。

学术界一般将俞曲园先生定位为“朴学大师”，对他的公羊学思想自然也颇重视。章太炎先生注意到他治《春秋》“颇佑公羊氏”，傅斯年先生则在“主义”意义上将他归入公羊家行列。然而，多数学人对他的公羊思想却未作深入研究，仅从所谓“学无常师”之说着眼，未作钩稽。同时，还有些文章说他虽“涉猎《公羊》之微言大义”，尚“不及三科九旨”，“更无论大一统”（见《清儒学案新编》），也有人说他的公羊思想来自廖平等。这些意见似可商榷。罗雄飞同志此书在爬梳文献史料的基础上，对俞曲园的公羊思想进行了系统研究，用确切、详赡的史料论证了公羊思想是其治经的指导思想，称他为以朴学著称的公羊学家，在学术定位问题上提出新见，确为发前人之所未发。

俞曲园先生一生所涉猎的学术门类极其广泛，致使研究工作头绪繁多。先生生平既不愿“空言心性”，更不肯“高谈经济”，妄论时事，留下篇幅齐整“思想性强”的作品不多。特别条件和生活景况使得他说话非常隐晦、含蓄，研究工作索解为难。罗雄飞同志不畏艰难，认真研读《春在堂全书》，分理爬梳，厘清先生学术思想的基本面貌和内在理路。在此基础上整理成学术专著，结构明晰、一气贯通，颇见功力。

俞曲园是晚清汉学的“殿军”人物，就时代条件而论，他思想上和学术上存在明显的局限和不足，如以疑似之见立说，以淡漠的态度对待西学等等，所在皆是。但对这些，作者没有作简单处理，而是结合时代背景，着眼于学术发展的内在契机，既指出其局限性，又尽量挖掘其中之合理成分，再为评析解说，态度不得不谓慎重，故而乐为序。所望于作者者不外加强对儒家伦理道德、精神信仰、人生价值之综合研究，更期有望于今后学术思想之大成。

刘桂生

2005年12月于清华大学



序 二

“学术”一词在中国古已有之。先秦典籍《礼记·乡饮酒义》云：“古之学术道者，将以得身也。”《史记·张仪列传》亦称张仪“始尝与苏秦事鬼谷先生，学术，苏秦自以不及张仪。”这些皆为古人使用学术一词的例证。关于学术的概念解释，学界曾有多种说法，其中，梁启超所作的界定比较有代表性，其云：

学也者，观察事物而发明其真理者也；术也者，取所发明之真理而致诸用者也。例如，以石投水则沉，投以木则浮，观察此事实，以证明水之有浮力，此物理也。应用此真理以驾驶船舶，则航海术也；研究人体之组织、辨别各器官之机能，此生理学也；应用此真理以疗治疾病，则医术也。……学者术之体，术者学之用。二者如辅车相依而不可离。（《饮冰室文集》之25《学与术》）

梁启超把学术视为理论知识与技术知识的有机结合，是甚有道理的。依此而言，所谓学术可理解为是人类在自己的实践活动中创造出的具有系统性、专门性的知识体系。

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国人于自己的文化传统、学术传统极为珍视。历代治国者及文人学士都非常看重学术的社会作用和意义，把学术的兴衰与社会发展的命运紧密地联系起来。如清初大儒顾炎武就把学术空疏、风

俗浇漓，看作明亡的重要原因之一，而主张“明学术，正人心，拨乱世以兴太平之事。”（《亭林文集》卷2《初刻日知录自序》）王国维亦言：“国家与学术为存亡。”（《观堂集林》卷23《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这些都说明，学术在文化系统中属于核心的、高级的层次，在社会历史的发展中自有其不可替代的特殊功能。中国传统学术的积累极为丰厚，学术形态多变多姿。沿用梁启超的说法，由先秦迄至明清，中国传统学术大致经历了先秦诸子学、两汉经学、魏晋南北朝的玄学与佛学、宋元明理学、清代汉学（亦称考据学）（《饮冰室文集》之7《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等几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它们千姿百态，各领风骚，显示出中华学术文化的博大精深。

至于谈到清代学术，人们通常把汉学称为其时最有代表性的学派。清代学术，学派如林，著述如云，汉学不过是其中之一而已。然而，其乘清初理学弩末之弊，悄然崛起，蔚成风气，于学界独树一帜，并以明显的优势驾于程朱理学之上，壮大为有清一代的显学，实非偶然。清代汉学以汉儒为宗，以儒家五经为主要研究对象，以“无证不信”、“以古为尚”为治学信条，对古代文献进行了全面的整理，在校勘、训诂、辑佚、音韵等方面均取得显著成就，推动了经史各学的发展。道光初，儒臣阮元编辑《皇清经解》（刊于1829）收录从清初至嘉道间经学、考据学著作173种，凡1408卷，展现出晚清以前汉学的兴盛繁荣状况。梁启超说：“当时学者，以此种学风相矜尚，自命曰朴学。其学问之中坚，则经学也。经学之附庸则小学，以次及于史学、天算学、地理学、音韵学、律吕学、金石学、校勘学、目录学，等等，一皆以此种研究精神治之。”（《清代学术概论》）

清代汉学既有如此辉煌的成就，自然备受研究者的青睐，一直是学术研究中的经久不衰的热门课题，涌现出的研究成果不胜枚举。远者不论，仅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笔者见到海内外出版的有关清代汉学、考据学及学术史的专著就有《清儒学案新编》（杨向奎清代学术探研录）（王俊义）、《清代经学史通论》（吴雁南）、《清初学术思辨录》（陈祖武）、《四库全书纂修研究》（黄爱平）、《朴学与清代社会》（黄爱平）、《乾嘉考据学研究》（漆永祥）、《清代考据学研究》（郭康松）、《清初易学》（汪学群）、《清初三礼学》（林存阳）、《清代子学研究》（刘仲华）、《清代新义理学》



(〔台湾〕张丽珠)、《从理学到朴学》(〔美〕艾尔曼)等十余种,发表的大量论文尚不计算在内。可谓硕果累累,成绩斐然。然而,如果仔细推敲,这些成果研究的重点主要集中在清代中前期,而对于晚清汉学则鲜有论述,即使偶有涉及,也多讲的笼统简略,大而化之,鲜有深入、精确的研究。可以说,晚清汉学尚为一般论者所忽视,是清代学术研究中的薄弱环节。

研究的薄弱直接影响到人们对于晚清汉学乃至晚清学术的看法与估价。不少论著在谈到晚清学术时只强调西学、今文经学的兴起,而于传统学术中的汉学、宋学,或者略而不论,或者论而不详,无法展示晚清学术的整体面貌。实际上,在鸦片战争后,汉学尽管已经步入衰途,但是由于历史运动惯性的作用,它还是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至少在中日甲午战争以前的数十年间,保持着一定的学术优势。光绪十四年(1888年),江苏学政王先谦仿阮元《皇清经解》体例编辑成《皇清经解续编》,主要汇集乾嘉以后数十年间汉研究成果,收录书籍209种,凡1430卷,在书籍种类、卷数上均超过阮氏所编《经解》。晚清汉学发展的真实情况于此可以窥见一斑。王先谦对于晚清汉学的成就颇为称道:

道光间,前大学士臣阮元总督两广,荟萃国朝学人撰著,刊于粤东,为《皇清经解》千四百卷,曾昭代之儒风,导后进以绳矩,优优棣棣,观者美焉。今距粤东刻经之日,踰六十年,中间寇难迭兴,烽警相望,而率土人士,内函贞固之气,外炳文明之姿,枕席可安,弦诵不辍,纂述之盛,视承平时亦无多让。(王先谦:《皇清经解续编序》)

梁启超也肯定包括汉学在内的晚清传统学术各派一度出现“向荣气象”,称:

光绪初年,一口气喘过来了,各种学问,都渐有向荣气象。清朝正统学派,即考证学,当然也继续工作。但普通经学史学的考证,多已被前人做尽,因此他们要走偏锋,为局部的研究。(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四)

另外，晚清汉学的学者阵容也很可观，学术造诣深厚、成就卓著的汉学家不断涌现，苦力支撑着已处颓势的传统汉学殿堂。其中佼佼者有：陈奂、陈乔枏、马瑞辰、刘文淇、刘毓崧、朱骏声、陈澧、郑珍、莫友芝、苗夔、丁晏、王筠、张文虎、黄式三、黄以周、俞樾、孙诒让、王先谦等。笔者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出过这样的观点：

大致来说，从嘉道年间到中日甲午战争前，是传统儒学的主流学派——汉宋学——继续延绵，并不断调整其内部结构，以应付所面临的危机及内外挑战的时期。在此期间，汉学虽然走向衰落，但依然保持着一定的规模，且有局部性的回升；程朱理学乘汉学衰落之机一度出现短暂的“复兴”，汉宋学关系发生了从“鼎峙”到“合流”的走向。从中日甲午战争后到清朝垮台的十余年，是中国传统儒学走向衰落和发生新转变的时期。科举制被废除，《四书》《五经》遭受冷落，再加上西学和今文经学的冲击，使汉宋学旧日的地位从根本上发生动摇。章太炎、刘师培等新一代汉学家在学术研究显示出的新趋向，反映了传统汉学在社会转型时期的新变化。（《略论晚清汉学的兴衰与变化》《史学月刊》2003年第3期）

关注晚清汉学，对于全面认识、把握晚清学术，乃至整个清代学术的变化规律、发展走向，关系甚重。当前重要的工作就是先从个案研究做起，这对比较缺乏研究的学术领域来说显得尤其紧要。罗雄飞同志的博士学位论文《俞樾的经学研究及其思想》，就是新近学界在这方面研究所取得的一个可喜的成果。

俞樾（1821—1907），字荫甫，号曲园，浙江德清人。道光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咸丰五年（1855）任河南学政，历两年罢职，寓居苏、杭。俞樾博览群书，学识渊博，治学以高邮王念孙父子为宗，承汉学院派一脉绪余，于经学、小学、诸子学多有发明。其著《群经平议》、《诸子平议》、《古书疑义举例》等，引经据典，掘发古义，深受时人所称



道。俞樾在著述的同时，还钟情于教育，先后任教于江苏、浙江等地多所书院，仅主讲杭州诂经精舍就长达30余年，造士无算。诸如戴望、黄以周、吴大澂、朱一新、谭献、吴昌硕、章太炎等，即其中之出类拔萃者。俞樾集名学者、教育家于一身，堪称一代儒宗，于晚清汉学发展多有贡献。对此，其高足章太炎有论曰：“浙江朴学晚至，则四明、金华之术弗之，昌自先生。”（《章太炎全集》第4册《俞先生传》）然而，迄今为止，学界对俞樾学术思想的研究却非常薄弱，成果寥寥。大陆方面的成果仅有杨向奎《清儒学案新编·俞樾曲园学案》、魏永生《俞樾尊荀析论》等少数几篇；台湾方面的成果也仅见有曾昭旭《俞曲园学记》与郑振模《清俞曲园先生樾年谱》等数篇。而比较系统深入地论述俞樾学术思想的成果，尚付阙如。这种现状与俞樾在历史上的地位极不相称。罗雄飞同志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对晚清学术用功甚勤，选择俞樾的学术思想作为研究课题，几经努力，终于完成博士论文《俞樾的经学研究及其思想》，为学界关于俞樾的研究贡献了新的成果。

以俞樾的经学研究及其思想为课题，这本身就是一个挑战性很强的选择。其难度不仅在于需要研读大量的文献资料，而且需要有一定的传统学术知识准备，要在经学、诸子学、小学、训诂学等方面下一定的工夫。掌握这些古奥知识对于一位青年学子来说，其困难程度是可想而知的。然而，面对难题，罗雄飞同志采取了知难而进的正确态度。他不惧困难，勤学好问，埋首钻研，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前进中的拦路虎，不仅掌握了研究的主动权，而且也锤炼了不惧困难、执着专一的顽强意志，为课题的完成创造了最为重要的精神条件。

如果谈到《俞樾的经学研究及其思想》的价值所在，我想至少有以下三点值得肯定：

其一，比较全面而深入地研究了俞樾学术思想。由于研究工作的不足，在现有的研究成果中，尚无全面论述俞樾学术思想的较有分量的著作。而本书作者本着求真求实的科学态度，努力收集、认真研读历史资料，对俞樾的经学研究及其学术思想进行了系统的考察，阐述了包括俞樾学术思想的渊源、学术思想的形成、主要学术成就及治学特征等基本问题，并联系社会变迁、时代潮流演进的历史大背景来总结其学术成就，评

价其学术得失与历史地位，清晰地揭示出俞樾学术思想内在构成及发展脉络，有助于人们从整体上予以把握。

其二，较为深刻地概括出俞樾治学风格的历史特征。作者对于俞樾学术研究的考察，不仅全面、系统，而且在许多问题上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发前人所未发，颇具学术创新的精神。作者在爬梳史料、辨明源流的基础上，概括俞樾治学风格的特征有四：一是重视以“文法”、“文例”治群经、诸子；二是重视“以疑存疑”；三是具有一定的公羊学倾向；四是遵循“实事求是”与“通经致用”、“会通融合”相结合的原则。这些概括都是建立在坚实的科学研究的基础之上，符合历史实际，为人们深入了解俞樾的学术思想提供了重要的线索。长期以来，人们多把俞樾归入汉学院派，忽视对其公羊学思想的吸收。作者经过深入考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俞樾的经学研究基本上继承乾嘉汉学院派一流注重考证、实事求是的学术风格，具有“以疑存疑”、不囿陈说的怀疑精神，但是，他又本着“会通融合”和“治经不分古今”的态度，对公羊学多有阐发和吸纳，甚至以公羊学观点指导对其他经传的训释。据此，作者对俞樾的学术定位提出新的看法：“俞樾从‘主义’上基本可归入公羊家队伍”，“他是一位具有公羊学思想的汉学家”。是为有别于传统观点的一家之言，有利于学界关于俞樾学术思想的深入探讨。

其三，讲究科学的研究方法。作者在撰写的过程中注意到历史研究与哲学思考的有机结合。一方面，作者根据俞樾的学术成果集中表现为文字校勘和训诂考释的特点，注意运用历史学、文献学、社会学等多种学科的方法进行学科交叉研究，力求从俞樾的考辨性文字、诗词、杂文及日常行事中，发掘出有用的材料，以还原其学术思想的本来面目。为此，作者付出了辛勤的劳动，把大量的精力放在对于史料的发掘和辨析方面，从而把全书主题观点建立于对历史材料考辨的基础之上。另一方面，作者注意避免发议论就事论事，而是就事论理，即对于历史现象进行理论抽象、哲学概括，并把研究对象放到一定的历史环境中去考察，注重研究对象与社会变迁之间的互动影响，强化了全书的理论色彩。

当然，任何一部学术著作都不可能做到十全十美，不可避免地会有这样或者那样的缺点，《俞樾的经学研究及其思想》也不例外，然而，这毕



竟瑕不掩瑜。这部著作的出版，无疑为学界关于俞樾的研究，乃至晚清汉学研究贡献了新的成果，有助于学术研究薄弱环节的弥补与充实。

我衷心希望罗雄飞同志在此基础上，再接再厉，继续奋斗，在科学研究的道路上“百尺竿头，再进一步”。

史革新

2005 年 12 月于北京师范大学



内 容 提 要

俞樾（1821—1907）是晚清著名的经学家与经学教育家。作为一位经学大师，他继承了乾嘉时期著名汉学家王念孙、王引之父子的治学方法，围绕经学研究，遍注群经、诸子，在校勘、训诂古代典籍方面取得丰硕的成果。他又归纳总结古代汉语的内在规律，发明古文“文例”88条，从而开汉语文法研究之先河。

俞樾继承了乾嘉汉学实事求是的精神，校勘、训诂群经、诸子，能尽可能摆脱具体的学派立场束缚，并冲破古人的注疏重围。他以“声义相通”的方法，根据可靠的材料和文章的内在逻辑，订正、训释古籍中的语句、文字。这是对乾嘉汉学优秀成果的继承。在此基础上，他形成了自己的治学风格和特点。这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其一，重视以“文法”、“文例”治群经、诸子。前人对古汉语文法虽也有零星论及，如王念孙、王引之父子，他们所作《经传释词》，亦可说是对古代文法的一次总结。然王氏父子和以往其他经学家，大多局限于古文词汇。到了俞樾那里，才触及到古人遣词造句的真正意义上的语法规则。他既对古文文法作了较系统的总结，文法自然成为他治群经、诸子的一大法宝。其二，俞樾特别重视“以疑存疑”。与乾嘉汉学家相比，他具有较突出的怀疑精神，注重提出新的见解。他一旦发现某一材料用前人的观点无法解释，便往往据此提出自己的看法，因而，据孤证以立异的情况往往有之。这从正面立说的角度来说，似乎显得不太严谨，但他以这种特殊的方式提醒人们注意传统观点中存在的问题，亦自有其价值。其三，俞樾虽是汉学家，但在“主义”上却

倾向公羊学。他吸收并发挥了公羊学的基本思想。他不仅以此解说《公羊春秋》，还以此指导对其他经传的训释。因此，他的学术成就虽体现在汉学方面，但与乾嘉时期的汉学家相比，又有很大差异。可以说，他是一位具有公羊思想的汉学家。其四，俞樾并不象乾嘉学者那样，专注于文字考据而逃避现实政治。他虽很少直接谈论现实政治，但治学思想则颇能适应当时的学术发展潮流。他的经学研究除坚持实事求是原则之外，还鲜明地体现着“通经致用”和“会通融合”的时代特征。到19世纪80年代以后，他更把学术研究与“守先待后”的文化使命紧密结合，以回应不断加深的社会与文化的现实危机。

在经学教育方面，俞樾亦取得很大成就。他在继苏州紫阳书院之后，长时期主讲杭州诂经精舍和归安龙湖书院、上海求志书院。门生弟子数以千计，章太炎、黄以周、刘恭冕、崔适、朱一新、王彦威、王诒寿、戴望、谭献、缪荃荪等著名学者都曾师从俞樾。正是在俞樾的影响下，浙江在晚清仍保持汉学重镇的地位。而他的弟子则不仅活跃于江浙地区，两湖乃至两广都曾有俞门弟子在其间引领风会。俞樾因此被尊为“东南大师”。

梯梁后学可以说是俞樾的主要学术取向。他不但通过自己几十年的经学教育培养了大批传统学术方面的人才，他的研究性著作特别是他的几部代表作，同样为后人的研究工作提供了条件与手段。因此，俞樾在学术发展史上的地位既体现在学术研究方面，更体现在学术传承方面。而咸同之际，中国传统学术尤其是汉学又正好处于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俞樾正是在这样一种特殊时期奠定了自己的特殊地位。如果不抓住这一点，我们就很难对俞樾作出恰当的评价。

俞樾作为活跃于晚清的经学家，与时代发展的要求相比，其局限性也很明显。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不能主动适应中西文化交流的新形势，对西学持一种漠视态度；二，在“道”、“学”、“政”紧密联系的时代背景下，他难以将实事求是的精神贯彻到底，存在以经学缘饰道德教化的倾向；三，以疑似之见立说。



Abstract

Yuyue, who carried on the scholarly research method of the father & son Wang Niansun and Wang Yinshi living mainly in the Qianlong and Jiaqing regimes, is a famous Jingxue scholar of the late Qing Period, he devoted himself in the Confucian Classics study and achieved great achievements in Qunjing and Zhuzi interpretation, ancient Classics collation and exegesis. He made himself pathbreaker in Chinese grammar studies when he summarized the internal development law and brought forth 51 old Chinese items.

Yuyue tried his best to tear himself away from the school standpoint and overcame the ancient people's commentary and subcommentary limitations as possible as he could when he himself interpreted Qunjing and Zhuzi because he inherited the practical and realistic research way of the Qianjia school. He corrected and interpreted ancient Chinese sentences and words on the dependable materials and inner logics of the texts by employing the studying method of "shengyixiangtong (the pronunciation and significance are relative)". So he got his scholarly study style and characteristics on the basis of the inherited distinguished achievement which I'd like to summarize as below: First, he thought highly of using Wenfa and Wenli to study Qunjing and Zhuzi which the forefathers, like the father & son Wang Niansun and Wang Yinshi whose "Jingzhuan Shici" may be looked as a summation of the ancient Chinese grammar, had noted a little now and a little then. However, like the Wangs and most of the other formerly Confucian classics scholars confined themselves to the study of the ancient Chinese words, only

Yuyue had succeeded in paying attention to grammatical rules when the ancients shoes words and built sentences, so it is natural that grammar became a magic weapon in studying Qunjing and Zhuzi. ; Secondly, Yuyue valued the " yiyicunyi (doubt for doubt)" method very much. He cherished outstanding skepticism and attached importance to putting forward new ideas compared with the Qianjia school scholars. Because he always put forth his own ideas on a kind of materials when he found it impossible to interpret it with the predecessors viewpoint, it is common for us to see the case of advancing a different argument with only a single evidence. It is seems that this is not too strict from an angle of establishing his theory positively, but it is precious to remind the people of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existed problems in traditional ideas in a special way. Thirdly, though Yuyue was a scholar majoring in the Confucian classics of the Han Dynasty, he was doctrinally a Gongyangist. He assimilated and developed the fundamentalism of the Gongyang school, and used it not only to expound " Annals of Gongyang", but also to guide himself in interpreting the Jingzhuan of Confucian classics. Though research in the Han Dynasty's Confucian classics reflected his achievements, he was greatly different from those of the Qianjia school scholars. We can say he is a Gongyang—styled Han Dynasty Confucian classics scholar. Lastly, unlike the Qianjia school scholars who devoted themselves in interpreting the Confucian Jingzhuan classics and shirking the then political reality wholeheartedly, though Yuyue seldom talked about the then politics directly, his idea of scholarly research could conform to scholarship development of his time in a great degree. The principle of his Confucian classics study embodied the " Tongjingzhiyong (to master Jing and to use)" and " Huitongronghe (achieve mastery through a comprehensive study of the subject)" characteristics of his time. He integrated scholarly research closely with cultural mission of " Shouxian daihou (to preserve the originals and wait for the later correctness)" to respond to the ever—deepening actual social and cultural crisis after 1880s.

Yuyue achieved great achievements in the Confucian classics education. After tutoring at Ziyang Academy in Suzhou, he worked at Gujingjingshe in Hangzhou, Longhu Academy in Guian, and Qiuzhi Acade-